

学术史丛书

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

陈平原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/ 陈平原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5.9
(学术史丛书)

ISBN 7-301-09539-2

I. 触… II. 陈… III. 五四运动 (1919) - 研究 IV. K261.1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98456 号

书 名 :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

著作责任者 : 陈平原 著

责任编辑 : 张凤珠

标准书号 : ISBN 7-301-09539-2 / I·0755

出版发行 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 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 : <http://cbs.pku.edu.cn> 电子信箱 : pkuwsz@yahoo.com.cn

电 话 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

排 版 者 : 北京军峰公司

印 刷 者 :

经 销 者 : 新华书店

650mm×980mm 16 开本 24.75 印张 366 千字

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: 32.00 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

“学术史丛书”总序

陈平原

所谓学术史研究,说简单点,不外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。通过评判高下、辨别良莠、叙述师承、剖析潮流,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,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,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——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。至于压在纸背的“补偏救弊”、“推陈出新”等良苦用心,反倒不必刻意强调。因为,当你努力体贴、描述和评判某一学术进程时,已有意无意地凸显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。

其实,此举并非今人的独创。起码黄宗羲的《明儒学案》、江藩的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已着先鞭,更不要说梁启超、钱穆各自独立完成的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。至于国外,同类著述也并不少见,单以近年译成中文的为例,便有古奇的《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》、丹尼尔的《考古学一百五十年》、尼古拉耶夫等的《俄国文艺学史》、勒高夫等的《新史学》,以及柯文的《在中国发现历史》等。

即使如此,90年代中国学人之热中于谈论“学术史”,依然大有深意。一如黄宗羲之谈“明儒”、梁启超之谈“清学”,今日之大谈学术史,也是基于继往开来的自我定位。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,希望借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来获得方向感,并解决自身的困惑,这一研究策略,使得首先进入视野的,必定是与之血肉相连的“20世纪中国学术”。

当初梁启超撰写《清代学术概论》,只是其拟想中的《中国学术史》之第五种;今人之谈论“学术史”,自然也不会以“20世纪”自限。本丛书不只要打通古今,更希望兼及中外——当然,这指的是丛书范围,而不是著述体例。

无论是追溯学科之形成,分析理论框架之建构,还是评价具体的名家名著、学派体系,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。在这个意义上,学术史与思想史、文化史确实颇多牵连。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共同制约,更有内在理路的相互交织。想像学术史研究可以关起门来,“就学问谈学问”,既不现实,也不可取。

正因如此,本丛书不问“家法”迥异、“门户”对立,也淡漠“学科”的边界与“方法”的分歧,只要是眼界开阔且论证严密的学术以及思想史、文化史方面的著述,均可入选。也许,话应该倒过来说:欢迎有志于通过触摸历史、感受传统、反省学科进而重建中国学术的学人,加盟此项说大不大、说小不小的“文化工程”。

1998年8月4日

目 录

“学术史丛书”总序	陈平原	/1
导言	文本中见历史 细节处显精神	/1
第一章	五月四日那一天	
	——关于“五四”运动的另类叙述	/8
一	关于“五四运动”	/8
二	五月四日那一天	/12
	花开春日 /13 集会天安门前 /17 受气东交民巷 /23	
	火烧赵家楼 /28 夜囚警察厅 /34	
三	如何进入历史？	/38
四	回到“五四”现场	/41
第二章	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	
	——《新青年》研究	/50
一	同人杂志“精神之团结”	/52
二	“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”	/61
三	以“运动”的方式推进文学事业	/67
四	文体对话与思想草稿	/79
五	提倡学术与垄断舆论	/91
六	文化资本与历史记忆	/104
第三章	叩问大学的意义	
	——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	/117
一	“兼容并包”的大学理念	/117
二	北大传统的另一种阐释	/127
三	老北大的艺术教育	/135

	美育而非美术 /136	社团而非院系 /142	从音乐研
	究会到音乐传习所 /146	中乐与西乐之争 /150	
	博雅传统与“爱美的” /154		
第四章	学问该如何表述		
	——以《章太炎的白话文》为中心 /157		
一	古文的骄傲与白话的先驱 /159		
二	令人神往的“提奖光复,未尝废学” /171		
三	深思独得与有感而发 /185		
四	白话文的另一渊源 /197		
第五章	经典是怎样形成的		
	——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 /207		
一	删诗事件 /209		
二	老朋友的意见 /214		
三	学生的建议 /219		
四	二周的眼光 /227		
五	胡适的自我调整 /239		
六	经典地位的确立 /251		
第六章	写在“新文化”边上		
	——旧纸堆里的新发现 /265		
一	失落在异邦的“国故” /266		
二	在巴黎邂逅“老北大” /280		
三	不该被遗忘的“文学史” /292		
四	八十年前的中学国文教育之争 /305		
附录一	关于《章太炎的白话文》 /318		
附录二	鲁迅为胡适删诗信件地发现 /328		
附录三	台湾版《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》自序 /334		
	引用及参考书目 /338		
	索引 /349		
	后记 /380		

作者小传

陈平原,1954年生,广东潮州人。198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,获文学硕士学位;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,获文学博士学位。此后历任北大中文系讲师(1987年起)、副教授(1990年起)、教授(1992年起)。现为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、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、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。曾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、德国海德堡大学、英国伦敦大学、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以及香港中文大学、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。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20世纪中国文学、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、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、图像研究等。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“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”(1991年);获全国高校一、二、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(1995年、1998年、2003年)等。先后出版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》、《千古文人侠客梦——武侠小说类型研究》、《小说史 理论与实践》、《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》、《中国大学十讲》、《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——明清散文研究》、《中国散文小说史》等著作三十种。另外,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,1991—2000年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集刊《学人》;2001年起主编学术集刊《现代中国》。

导言

文本中见历史 细节处显精神

在很多才华横溢的研究者看来,作为课题的“五四新文化”,早已是明日黄花,不值得格外关注。原因呢,据说是研究著作汗牛充栋,该说的都说了,很难再有新的发现;经过八十多年的争夺,论题及证据多被意识形态“污染”;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该轮到长期被压抑的晚清引领风骚了。可我还是认定,这一曾经十分时尚、如今略显落寞的题目,仍然蕴涵着无限生机。

正如美国学者舒衡哲所说的,“五四的回忆史”之所以值得我们认真面对,就因为这些五花八门的“陈述”,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“历史”,更多的是表达某种政见和立场。“在中国大陆和台湾,纪念和回忆一直错综复杂地联系着。个人的回忆从未摆脱社会历史的需要,1949年之后更是如此。”^①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。另外,由于“五四”运动具有极高的知名度与合理性,经由一次次纪念仪式的召唤,当事人的“回忆”日渐清晰,而且“想象力忽然丰

^① 薇拉·施瓦支 (Vera Schwarcz) 著、李国英等译:《中国的启蒙运动——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》308页,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,1989年。

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”^①。所有这些,都对阅读、理解、诠释作为思想潮流/文学革命/政治运动的“五四”,构成了某种巨大的障碍。即便如此,无论是一场纷纭复杂的政治运动,还是一本版本确凿的著述,诠释活动潜在的无限性,并不意味着其无所归依,可以像流水一样毫无约束地随意蔓延^②。毫无疑问,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,诠释者对事件以及文本的解读,总是不尽如人意。但同是诠释,有高低雅俗之分。更重要的是,学者们的诠释活动,反过来会影响当事人对于事件(比如“五四”)的追忆。

并非抹煞官方与民间在“五四记忆”上的巨大差异,也不回避左派与右派都喜欢拿“五四”做文章,我只是强调,每个研究“现代中国”的学者,都可能参与到建构“五四”传统的行列中。不管你是主张继承,还是希望反叛,直面“五四”,是我们的共同命运。十二年前,在北京大学召开的“纪念五四学术研讨会”上,我做了题为《走出“五四”》的专题发言,其中提到:

“五四”除了作为历史事件本身的意义,很大程度成了 20 世纪中国人更新传统、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象征。每代人在纪念“五四”、诠释“五四”时,都不可避免地渗入了自己时代的课题和答案。但另一方面,以“五四”命名的新文化运动,又有其相对确定的历史内涵。其文化口号、其学术思路,萌芽于晚清,延续至今日——可以这么说,在思想文化领域,我们今天仍生活在“五四”的余荫里。^③

^① 钱锺书《写在人生边上·重印本序》称:“我们在创作中,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,而一到回忆时,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、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,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。”《写在人生边上》5 页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0 年。

^② 我同意符号学家兼小说家艾柯的意见:“说诠释(‘衍义’的基本特征)潜在地是无限的并不意味着诠释没有一个客观的对象,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像水流一样毫无约束地任意‘蔓延’。”“在神秘的创作过程与难以驾驭的诠释过程之间,作品‘本文’的存在无异于一支舒心剂,它使我们的诠释活动不是漫无目的地到处漂泊,而是有所归依。”参见艾柯等著、王宇根译《诠释与过度诠释》(北京:三联书店,1997 年)28 页、108 页。

^③ 参阅拙文《走出“五四”》,见拙著《学者的人间情怀》69—75 页,珠海:珠海出版社,1995 年。文中,我将“五四”建立起来的学术范式简要概括为:“西化的思想背景;专才的教育体制;泛政治的学术追求;进化”、“疑古”、“平民”为代表的研究思路。”

时至今日,我仍坚持这一看法。所谓“超越五四”,首先是深入理解“五四”那代人的历史语境、政治立场、文化趣味以及学术思路。

人类历史上,有过许多“关键时刻”,其巨大的辐射力量,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。不管你喜欢不喜欢,你都必须认真面对,这样,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,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。在我看来,“‘事件’早已死去,但经由一代代学人的追问与解剖,它已然成为后来者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料”^①。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,“五四”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。作为后来者,我们必须跟诸如“五四”(包括思想学说、文化潮流、政治运作等)这样的关键时刻、关键人物、关键学说,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。这是一种必要的“思维操练”,也是走向“心灵成熟”的必由之路。

与“五四”对话,可以是追怀与摹写,也可以是反省与批判,唯一不能允许的,是漠视或刻意回避。在这个意义上,“五四”之于我辈,既是历史,也是现实,既是学术,更是精神。

必须说明的是,本书之谈论“五四”,有个明显的特点,那就是兼及“晚清”(如探究《新青年》的编辑方针、章太炎的白话文、傅斯年之批注《国故论衡》、梁启超的谈论中学国文教学等)。这不仅仅是具体的论述策略,更是作者一以贯之的学术立场。谈论“五四”时,格外关注“‘五四’中的‘晚清’”;反过来,研究“晚清”时,则努力开掘“‘晚清’中的‘五四’”。因为,在我看来,正是这两代人的共谋与合力,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。

在1988年出版的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》一书的“导言”中,我专门谈到:

毫无疑问,五四作家和被他们称为“老新党”的“新小说”家有很大的差别——从思想意识到具体的艺术感受方式。但我仍然把梁启超、吴趼人、林纾为代表的“新小说”家和鲁迅、郁达夫、叶圣陶为代表的五

^① 参见拙文《无法回避的“1968”》,《万象》创刊号,1998年11月;拙著《茱萸集》113—124页,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2001年。

四作家放在一起论述,强调他们共同完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。^①

十年后,我撰述并出版了《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——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》,在“导论”中再次强调:

承认晚清新学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某种潜在而微妙的制约,这点比较容易接受。可本书并不满足于此,而是突出晚清和五四两代学人的“共谋”,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天地。……

讨论学术范式的更新,锁定在戊戌与五四两代学人,这种论述策略,除了强调两代人的“共谋”外,还必须解释上下限的设定。相对来说,上限好定,下限则见仁见智。在我看来,1927年以后的中国学界,新的学术范式已经确立,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,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登场。另一方面,随着舆论一律、党化教育的推行,晚清开创的众声喧哗、思想多元的局面也不复存在,取而代之的是立场坚定、旗帜鲜明的党派与主义之争,二十世纪中国学术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。^②

正因为兼及“五四”与“晚清”,这种学术视野,使得我必须左右开弓——此前主要为思想史及文学史上的“晚清”争地位;最近十年,随着“晚清”的迅速崛起,学者颇有将“五四”漫画化的,我的工作重点于是转为着力阐述“五四”的精神魅力及其复杂性。

活跃于1880至1930年代这半个世纪的文人学者,大致上可分为“戊戌的一代”和“五四的一代”,前者如黄遵宪、林纾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等,后者则有蔡元培、陈独秀、鲁迅、周作人、胡适等。这确实是两代人,可思想

^① 参见拙著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》30—31页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8年。

^② 参见拙著《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——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》6—8页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8年。

学说以及文学趣味上有大量重叠或互相衔接的成分。正是这两代人,共同创造了我们今天所再三评说的“新文化”。因此,我更愿意把这两代人放在一起论述,既不独尊“五四”,也不偏爱“晚清”。

随着话题的转移,有时“晚清”,有时“五四”,这很好理解。考虑到新文化的多面向,在不同学科之间来回穿梭,有时文学、政治,有时艺术、教育,这也不难说明。需要略加解释的是,何以如此重要的话题,最后竟落实在若干个案的辨析上——谈论“五四”新文化,入手处竟然是一场运动、一份杂志、一位校长、一册文章以及一本诗集等。这样的论述策略,能否承担引领读者“进入五四”的重任?

对于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这样众说纷纭的话题,确实是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”。作为研究者,你可以往高处看,往大处看,也可以往细处看,往深处看。我采取的是后一种策略——于文本中见历史,于细节处显精神。

所谓“触摸历史”,不外是借助细节,重建现场;借助文本,钩沉思想;借助个案,呈现进程。讨论的对象,包括有形的游行、杂志、大学、诗文集,也包括无形的思想、文体、经典、文学场。入口处小,开掘必须深,否则意义不大;不是所有琐琐碎碎的描述,都能指向成功的历史重建。我曾经引胡适和王国维关于学问的两段话,辨析学术研究中的“大”与“小”。一说“学问是平等的”,一说“考据颇确,特事小耳”,抽离具体的历史语境,呈现出某种张力。单就学术训练而言,只要干脆利落地解决某一课题,便该得满分;可治学毕竟不同于做习题,应该还有更高一层的追求。这个时候,所谓的“事大”、“事小”,便可能影响价值评判。当然,这里所说的大与小,并非指事物本身的体积,而在于其能否牵一发而动全身,有无深入发掘与阐释的可能,以及是否切合自家心境与文化理想。^①

选择新文化运动中几个重要的关节点,仔细推敲,步步为营,这一研究思路,受到了鲁迅先生的启示。选择“药·酒·女·佛”来谈论汉魏六朝文章,

^① 参见《现代中国》第二辑(武汉:湖北教育出版社,2002年3月)的《编后》。所引胡适文字见《〈水浒传〉后考》,王国维文字见姚名达《哀余断忆》。

这是一种学术上的冒险,可鲁迅成功了。“舍弃了面面俱到的评说,抓住几个突出的文化现象‘小题大做’,不只需要学力深厚,更需要思想家透视历史的敏锐目光。”^①我之谈论“五四”新文化,选择广场上的学生运动、《新青年》中的文体对话、蔡元培的大学理念、章太炎的白话试验、北大的文学史教学,还有新诗的经典化过程等,不见得十分到位,但都有自家面目。

记得本书第一章单独发表时,便有台湾朋友询问:是否借鉴了年鉴学派或新历史主义。我的回答很坦然:确实读过一点斯蒂芬·葛林伯雷(S. Greenblatt)、海登·怀特(Hayden White)以及布罗代尔(F. Braudel)、勒高夫(J. le Goff)等人的著作,但不敢胡乱攀附。我之所以如此述学,主要受三位中国学者的启示。

本书第六章的题目,明眼人一看都知道,这是在追摹钱锺书的随笔集《写在人生边上》。并非追求“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”,而是意识到“五四”新文化“这本书真大!一时不易看完”,与其像钱先生所嘲笑的那些“负有指导读者、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”的书评家那样,“无须看得几页书,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”,还不如“不慌不忙地浏览”,“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”,留下若干属于自己的真切感受^②。这种拒斥过分的体系化、注重真切感受的论述策略,在《谈艺录》、《管锥编》等名著中清晰可见。

其实,我之倾向于在“边”上做文章,还有另外一个来源,那就是金克木的抓“边”。在《说“边”》一文,金先生开宗明义:“现在的人喜欢讲中心,不大讲边,其实边上大有文章可作。没有边,何来中心?中心是从边上量出来的。”有空间的边,那就是边疆;有时间的边,那就是新旧交替;还有“现象和意义之间的边,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边,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边”——所有这些“边”,都值得认真琢磨^③。

^① 参阅《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》,见拙著《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》14—55页,南宁:广西教育出版社,1999年。

^② 参见钱锺书《写在人生边上·序》,《写在人生边上》1—2页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0年。

^③ 参见拙文《〈“读书”时代〉的精灵——怀念金克木先生》,《读书》2000年12期;《茱萸集》78页,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2001年。

至于在史学研究中,强调对于古人的同情与体贴,警惕“过度阐释”,则有陈寅恪的影响在内。陈先生在谈论哲学史写作时,说过这么一段话:

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,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,欲借此残余断片,以窥测其全部结构,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,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,始可以真了解。所谓真了解者,必神游冥想,与立说之古人,处于同一境界,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,表一种之同情,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,而无隔阂肤廓之论。^①

了解今人进入历史的困难,以及所谓历史重建的复杂性,不敢放言空论。或许,对于史学家来说,次序井然、因果明确、排列整齐、体系严密,不见得都是好事情。

至于像本书这样,借助若干自以为意味深长的细节、断片、个案,来钩稽并重建历史,固然可以避免“宏大叙事”的某些缺陷,但也可能走到另一个极端,那就是将一场生气淋漓的文化运动,拆解成“一地鸡毛”。这是我所最为警惕的。换句话说,有趣的人物及故事背后,依然有作者潜藏着的理论意识:包括重建现场时多声部与主旋律的关系、“晚清”与“五四”两代人如何既合力又竞争、新文化运动中垄断舆论与提倡学术的张力、现代中国大学理想的生成与展开、媒介的作用与文体的意义等。

今人所接触到的,永远只能是“文明的碎片”在这个意义上,谈论历史而倚重省略号,其实是相当明智的。区区六章,只是勾勒了“五四”新文化的某一侧面。若能给读者些许真切的感受,帮助其“进入五四”,则于愿足矣。

2005年6月9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

^① 陈寅恪:《马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》,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247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0年。

第一章

五月四日那一天

——关于“五四”运动的另类叙述

关于“五四运动”
五月四日那一天
如何进入历史？
回到“五四”现场

一 关于“五四运动”

在 20 世纪中国，“五四”运动是个使用频率极高的专有名词，老百姓耳熟能详，学界更是了如指掌。作为一门新崛起的显学（相对于四书五经或唐诗宋词），关于“五四”的研究著作，确实称得上“车载斗量”。八十年来，当事人、反对者、先驱、后学，无不激扬文字，留下各自心目中的“五四”。仔细分梳这些色彩斑斓而又互相牴牾的图景，那是专家学者的工作；至于一般读者，只需要对这场影响极为深远、不断被后人挂在嘴边的群众运动，有个大致的了解。

于是,我选择了权威的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》,希望能得到一个简明扼要的答案。因为,与“成一家之言”的专家著述不同,辞书讲究准确、简要、平实。谁都知道,若想尽快进入某一特定语境,没有比借助辞书更合适的了。可不看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。纷纭复杂的“五四”,固然并非三言两语就能打发,可“百科全书”出现如此多的错漏,毕竟出人意料。看来,“耳熟能详”、“了如指掌”云云,需要打点折扣。

以下抄录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》中“五四运动”这一词条,然后略做补充、辨析。文中*号为笔者所加,目的是提供对照阅读的线索。

五四运动 (May Fourth Movement) 1919年5月4日中国发生的一次群众运动,其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。一般认为,这次运动是现代中国的一场文化和思想上的启蒙运动*。1919年1月,各协约国谈判对德和约,消息传到中国,中国人得悉和会决定将原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特权转交给日本,同时日本政府对以军阀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,提出二十一条要求,企图独自支配全中国*。当北洋政府即将签订和约并答应二十一条要求的消息传开时,北京13所大专院校的3000余名学生举行罢课*,提出“外争国权,内惩国贼”、“取消二十一条”、“拒绝和约签字”等口号,同时举行游行示威。政府军警对运动实行镇压,逮捕学生32人,这立即引起北京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,随后全国各地学生纷纷走上街头,举行示威游行,召开宣传大会,并实行抵制日货。6月3—4日,北洋政府进行了大规模逮捕,仅北京一地,即有千名学生被捕。运动声势波及各大城市,上海、南京、天津及其他各地的工人举行罢工,上海各家商店举行罢市,以声援学生和工人,全国文化界也表达了对这次群众性斗争的同情,斗争随即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革命运动。北洋政府最后被迫释放全部被捕学生,将三名亲日的内阁总长撤职*,并答应将不签订和约及二十一条要求*。

五四运动前夕,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、陈独秀、毛泽东开始创办刊物、发表文章,提倡民主和科学,批判中国传统文化,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,推动新文化*。温和派知识分子以胡适为代表,反对马克

思主义,却强烈支持文学改革,主张用白话文代替古文 提倡婚姻自由,反对父母包办 主张取缔娼妓 并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*。五四运动既加速了国民党的改组,也为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基础。

—— 录自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》(北京·上海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1986)

关于“五四运动”,不同政治立场及思想倾向的论者,会有相去甚远的解释。注重思想启蒙的,会突出《新青年》的创办、北京大学的改革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对“五四事件”的决定性影响,因此,论述的时间跨度,大约是1917至1921年 表彰爱国主义的,则强调学生及市民之反对北洋军阀统治,抵制列强霸权,尽量淡化甚至割裂5月4日的政治抗议与此前的新文化运动的联系。但不论哪一种,都不会只讲“文化和思想”,而不涉及“政治和社会”。承认5月4日天安门前的集会游行具有标志性意义,那么,所论当不只是“思想启蒙”,更应该包括“政治革命”。

“二十一条”乃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秘密条款,由日驻华公使于1915年1月当面向袁世凯提出。同年5月7日,日本提出最后通牒,要袁世凯在四十八小时内答复。两天后,袁除对五号条款声明“容日后商议”外,基本接受日本要求。1919年1月,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,要争取的是废除“二十一条”,归还山东,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等,而不是是否答应“二十一条”。另外,袁世凯死于1916年6月6日,“同时”一说,令人误会 1919年的中国,仍由袁执政。其时中华民国的总统乃徐世昌,总理为钱能训,外交部长则是率团出席巴黎和会的陆徵祥。

“北京13所大专院校的3000余名学生”举行的不是“罢课”,而是示威游行——事件发生在1919年的5月4日。由于政府采取高压政策,逮捕了32名学生,第二天方才有各专门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集会,决议自即日起一律罢课,同时通电全国并上书大总统。而《上大总统书》上签字的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有23所,代表9860名学生。

北洋政府被迫释放全部被捕学生,是在6月7日。免去曹汝霖、章宗